

从「锈带」到「秀带」

天津第一机床总厂的焕新答卷

祝捷 李赛

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146号,一处承载着七十余年工业记忆的厂区正发生着蜕变。曾经机器轰鸣的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如今褪去锈迹与烟尘,以产业园区的崭新面貌,完成了从工业“锈带”到城市“秀带”的华丽转身。这场跨越时光的城市更新实践,不仅让这座工业遗产重获新生,更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交织中,编织出属于城市的新叙事。

天津第一机床总厂的历史,是新中国工业崛起的生动缩影。1951年,这座以“示范”为名的机器厂开始筹建。“公私合营”的独特模式凝聚着社会各界的力量,而“示范”二字则承载着提升民族工业水平的重任。1953年,工厂成功试制出C620车床,这是我国首台仿苏IA62全齿轮传动车床,次年便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赢得赞誉;1956年,毛主席亲临该厂视察时作出“自力更生,多出新产品”的嘱托,更成为几代国人的精神坐标。从支援国家重点项目到自主研发齿锥齿锥齿锥齿锥,使中国跻身该领域世界四强,这座工厂历经五个发展阶段、三次扩建,最终成长为占地面积近30万平方米的工业大厂,“津一”商标也成为中国驰名商标,见证着新中国机床工业从无到有的艰辛与辉煌。

2022年6月,我们所在的团队接过了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厂区更新的重任。历时两个月的四次规模化勘查中,队员们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为194栋建筑、12处构筑物、53台机器设备建立起“身份证”式的档案数据库。在调研中,历史的印记随处可见:斑驳的红色标语仍透着当年的豪情,毛主席视察的老照片定格住工人们自豪的瞬间,幼儿园里未擦拭的黑板报仿佛还回荡着孩童的笑声。老人们的讲述更让工业遗产有了温度——坚固的牛腿柱、纵横的管廊、锈蚀的齿轮,不仅是工业设施,更是自力更生、奋进图强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的物质载体。这些发现让设计团队坚定了“修旧如旧、新旧共生”的理念,决心让工业遗产在保护中焕发新生。

更新改造的过程,是一场与历史的对话,更是一次小心翼翼的创新实践。对于厂区保留价值最高的工具车间,设计团队将其改造为机床工业博物馆,馆内珍藏的C620型全齿轮车床依旧矗立着,与其他老设备共同诉说着中国机床工业的奋斗史。建于1957年的苏联专家楼与会议室,以“古典主义”风格在工业建筑群中格外醒目。改造中,团队反复调试涂料配色还原历史风貌,室内则利用原有结构打造特色咖啡厅、齿轮、老图纸等物件的点缀,让进入店里的人们能触摸到岁月的痕迹。

曾经的职工食堂变身接待展示中心,东侧山墙被完整保留,成为大树庭院的天然背景;厂区幼儿园改造为室外休闲庭院,阳光透过枝叶洒落,与修复后的林荫球场相映成趣。施工过程中,团队将厂区内百余株老树视若珍宝,新铺的道路与花池如溪流般绕开深埋的根系,让斑驳老墙与新景绿植相融共生。过程中也曾遭遇狂风刮倒老树的意外,团队迅速排查隐患、加固设施,用责任守护着这场蜕变。当音乐喷泉首次调试,水柱随旋律起舞,水雾润泽了图纸上的墨线,也宣告着这场更新的阶段性成果正在展示。2023年的“津一·PARK 慢人生活节”,昔日的工业厂区彻底焕发新生:“匠心市集”里,非遗手作与文创潮玩吸引着不同年龄的游客,巨型麻花与煎饼馃子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露天音乐会、诗歌朗诵会轮番上演,林下篮球场与滨河露营地满是欢声笑语。设计师以普通市民的身份置身其中,看着图纸上的线条转化为生活的温度,所有挑灯夜战的辛苦都化作了眼底的星光。

从工业“锈带”到城市“秀带”,天津第一机床总厂的更新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与活化。它打破了工业遗产与现代生活的界限,让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在休闲与体验中得以延续;它探索了“保护与利用并重”的城市更新路径,为同类工业遗产的活化提供了宝贵借鉴。如今,月牙河畔的这片土地,既留存着新中国工业的奋斗足迹,也孕育着城市未来的活力。正如那些在废墟中顽强生长的树木,工业遗产的“新芽”正在时光中舒展,成为城市发展最动人的风景。

(祝捷系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研究员;李赛系天津泰达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



更新改造后的天津第一机床总厂部分建筑

口号,而是实践的目标、精神的支撑、解决问题的目标与思路。南开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接连遭遇“轮回教育”风波、“五教授离校”风波,前者是因为学生“吐槽”老师授课所用皆为外国笔记,学不到中国需要的真本领,引发轰动全国的大讨论;后者则是五位重要教授由于治学理念、薪资待遇、发展平台等原因,同时离职他就,令学校大伤元气。这样的打击不可谓不沉痛。张伯苓与南开团队痛定思痛,扎根现实,形成“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学科建设方向,“土货化”的自主治学方针,结合天津作为重要工业城市的特点,发展出南开独树一帜的特色。这是由理想与精神激发出的活力。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东北沦陷,华北危机加深。张伯苓不断将自己在威海卫的经历与思考讲给一届又一届南开学子,并发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他勉励南开学子,作为未来的精英,首先要认清局势,扛起责任。

当时,国民政府对外妥协,内战不已,在文化上开展所谓新生活运动,鼓吹封建道德。就在此时,张伯苓明确提出:“有人提倡读《孝经》,利用忠孝的观念去维系人民,去改良国政。我看我们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我们都应当读‘公经’。”在“读孝经不如读公经”这一思想指导下,南开明确了自己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能日新”源自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同时着眼医治“中华民族之大病”。这里的“病”是指我们的传统不适应现代化的部分,最主要的是“愚、弱、贫、散、私”五病。张伯苓就是要用现代国家观念整合社会,用大公、科学、自新、创新的精神化散、化私、去愚、去弱。

正是因为有了超越小我的精神追求,在日寇炸毁南开系列学校后,张伯苓才能说出那句震天动地的话:“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愈益奋励。”亲手肇画的校园化为焦土,但年逾花甲的张伯苓再次倒而复起。危机之中,南开反而变得更大,有了重庆南开中学、自贡蜀光中学,并与北大、清华合租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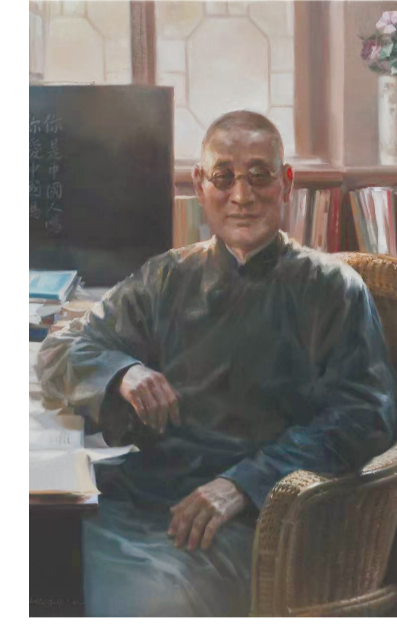
在乱世纷争中,张伯苓当然还有许多抱负并未实现,难免留下遗憾,但他坚信自己的人生选择。晚年回首往事,他曾说:“四十年前,有人说我教育救国的论调太高,今天证明我的看法并不错误。在将来,要请诸位不要忘记我的‘公能’理论。”

张伯苓的精神发展之路是从自我意识觉醒、国家意识觉醒开始的,在克服内心的苦闷,走出一个个困局后,逐渐升华为超越小我的“大公”。今天,张伯苓的精神发展之路对于理解教育的真谛,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困难、认识世界,塑造人格精神,实现人生价值,仍有着启示意义。

题图:张伯苓画像(油画),作者崔明非。

张伯苓的“精神现象学”

陈鑫



正视成败:由绝望到乐观

认识自我是精神成长的重要一步,却远非终点。大变局中,教育救国的道路注定荆棘丛生。

在学界领袖严修的支持下,张伯苓开启了教育实践,二人的合作从严氏家塾起,进而升级为南开学校。1908年,南开第一届学生顺利毕业,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梅贻琦、金邦正、张彭春、李麟玉、喻传鉴等皆出自此班。在外人看来,三十出头的张伯苓专事教育有成,桃李成行,但鲜有人知道,这时的他已心力交瘁。他曾表示,自己“一度身处绝望,幻想破灭,看不到任何希望与出路,甚至考虑过自杀”。

张伯苓的绝望源于有志难伸的彷徨。他下定决心广开民智,以教育争取民族独立。可现实中,他看到“我的人民的苦难与

会,自己培养的青年能否抵抗现实的裹挟?教育真能救国吗?惶恐中,张伯苓“逐渐生一厌世之心”,一度想要全身心投入宗教事务,寻求精神解脱。为此,严修与他连续多日彻夜长谈,鼓励他不要放弃办学,并帮助安排他出国考察,充分了解世界教育发展状况。

最终,张伯苓走出了阴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他在体育运动中得到的启示。体育要争取优胜,但是输赢绝不是全部目的。他多次讲到,体育的价值在于为更高更快而努力,在于奋斗、协作、讲求规则的过程。人生事业也是如此,成功与否受各种因素影响,做与不做则是自己的决定。只要认定方向,凭着良心去做,不必斤斤计较眼前得失。他说:“我们应做有益于群众的事业,侥幸胜了,不足为喜,因为我们的目的只在一辈子的奋斗,而不在一时的胜利。假如败了,也不要失望,因为失望能使你精神颓丧,减少你奋进的勇气。”这种精神来自体育,因此张伯苓表示“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他还将体育推向社会,成为中国奥运先驱。

张伯苓不但走出了绝望,还总结出了自己的“哲学”。面对困难,他会说:“十一月北风吹的顶厉害的时候,顶着北风走,这样顶下来,才能做大事。”遇到挫折,他又说:“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从此,他变成了学生们眼中“不可救药的乐观者”,一位“不倒翁”。他则说自己“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公能日新:小我融入大我

归根到底,张伯苓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倒而复起”,是因为他在认识自我之后,能够超越自我,追求为国为公的真理想,而非精致利己的“假有志”。

对张伯苓来说,为国为公从来不是空喊

今年是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办校长张伯苓先生诞辰150周年。近日重读先生的生平与讲话,被他精神世界的发展历程深深打动。

在张伯苓看来,教育绝不只是教知识、学技能,更是要陶铸精神。他曾说:“有精神者与无精神者竞争,则无精神者必败。”他与严修创办的南开学校,将塑造“南开精神”作为重要目标。在学校建立40周年之际,有校友写下这样一副对联:“正大经、立大体,赞天地之化育;顶到头、干到底,学校长的精神”。“校长的精神”是一个人的精神,一所学校的精神,也是张伯苓希望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注入的新精神。哲学家黑格尔曾在其代表作《精神现象学》中阐释人类精神从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发展到精神、绝对精神的过程。这里套用这一词汇,并非要做哲学研究,而是想借以梳理张伯苓精神世界的形成与升华过程,探寻其带给我们的启示。

正视自我:从玩世到觉醒

像所有人一样,张伯苓的精神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时代浪潮与个人磨砺共同塑造的。他幼年家道中落,不得不就读义塾,后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在科举时代,军校生社会地位并不高,但身为家中长子,张伯苓需要用军校津贴来帮补家用。所幸他在这里学到了那时绝大部分中国人还很难接触到的科学知识和对世界的认识,知性得以发展。张伯苓虽是“寒士”,可从小学习成绩极好,师长友人都夸他聪明。他颇为自得,言谈“放肆”,好与人辩论。回忆这段经历时,他坦言那时的自己“逐渐成一玩世之人”。

所谓“玩世”,本质是浑浑噩噩、无明确价值追求,是自我意识尚未觉醒的表现。这样的状态,在清末的中国绝非个例。张伯苓目之所及,皆是“官吏之腐败,人民之无国家观念”,整个社会在大变局中尚处迷茫。自我意识觉醒往往和外部强烈刺激有关。甲午战争中,张伯苓所在班级差一点被派往战场,只因海战失败太快太彻底,才未上前线。1898年,他又亲历了一场耻辱的交接仪式:第一天中国官兵从日军手中收回被占领的威海卫,次日又转“租”给英国。两天之内“国帜三易”。旗帜的更迭,映照出国家的孱弱无能,更让他深受刺激的是中英士兵的鲜明对比:英国士兵人高马大、不可一世,中国士兵则军装破旧、两肩高耸、面色憔悴,如“螻蛄式”。

张伯苓说彼时“好像自己照了镜子,丑态毕露”。这面“镜子”,照见了中国士兵的狼狈,更照见了自己年少玩世的浅薄。他反思,中国土地广袤、物产丰富,却屡屡被列强欺凌,根源便是人的精神出了问题。战败后,官兵兵但未卧薪尝胆,反而一蹶不振。耻辱的一幕让张伯苓的自我意识与国

1860年天津开埠后,西方体育竞相登陆,多种体育项目从津门进入中国,使近代天津孕育出独特、丰富、多元的体育文化。天津体育界的有识之士在寻求强国之路的艰难跋涉中,执着地追求和传播奥林匹克理念,并通过积极的实践创造了多项全国体育第一,使天津成为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领先城市。

体育徽章是徽章收藏的一个大项。1896年希腊雅典举办的首届奥运会,给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颁发了纪念奖牌,并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纪念徽章。起初这些徽章仅仅作为辨别运动员、裁判员、大会职员和新闻记者的标志,到1912年奥运会,运动员开始通过交换徽章作为互相增进友谊的一种方式。设计、制作奥林匹克运动纪念徽章随之成为惯例,每届奥运会都要制作大量徽章作为有代表性的纪念品。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各体育机构和团体、各种体育赛事和活动,发行了大量的体育奖章(奖牌)、证章、徽标和纪念章,琳琅满目,蔚为壮观。

近代以来,天津的邮票发行和机制币铸造取得了辉煌成就,与之相关,天津的徽章制作与发行也是硕果累累,其中体育徽章尤为突出。从铸有“天津体育社”铭文的清末保安奖牌、1918年南开篮球会奖章、1929年南开学校师生赠给著名体育活动家董守义的“为国争光”银盾、1930年天津特别市国术研究会证章、1936年天津体育协进会第一届竞走大会纪念章,到1960年全国棒球分区对抗赛天津赛区冠军奖章、20世纪70年代天津一些区县或单位举办长跑等群众性体育活动纪念章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不同时期天津体育开展情况及文化特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承办了很多全国性乃至世界级的体育赛事,推动了体育事业进步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也充分体现出天津文化的开放包容。

1995年,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简称“世乒赛”)在天津举办,中国乒乓球队包揽了全部项目冠军。

逢时击鼓奋争流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十七)

罗丹



洁上丛话

围绕本届比赛,以赛事会徽和吉祥物“仙客来”为图案的纪念章最为常见,有不同材质之分。金属材质纪念章外形为圆形或弧边正方形,背面为圆形卡帽式。瓷质纪念章通体白色,章面稍大,边缘环绕有文字信息,背面以别针固定。此外,沈阳造币厂还为这届比赛铸造了“精制镀金纪念章”。纪念章一套六枚,正面均为天津体育中心体育馆、会徽和年份。主章一枚,背面为吉祥物“仙客来”;副章五枚,背面分别为五种比赛类别的运动员造型。这套纪念章有多种包装,较有特色的是“仿水晶球牌形”。单枚主章或全套纪念章内嵌至乒乓球拍样式的透明器具中,做工精巧,独具匠心。

2013年,天津举办第六届东亚运动会。实体金属蝴蝶扣式纪念章的正面由东亚运动会英文首字母缩写“EAG”和该届运动会会徽两部分图案拼接组成。另一枚中国体育代表团徽章,则融入了象征友谊与和谐的吉祥物“津津”和“东东”,色彩明快,标志清晰,纪念性与传播性兼备。

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在天津举办。会徽由书法字“津”“13”“海河”等元素组合成火炬造型,在体现比赛主题的同时也彰显了天津地域特色。实体金属会徽为异形,徽章边缘贴合会徽图案设定,裁剪精细,造型感和辨识度十足。徽章的包装内衬纸,还可作为明信片邮寄使用,一举两得。

此外,天津体育教育事业一向发达,天津体育学院徽章也是天津体育徽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天津体育学院发行的一枚纪念铜章上,铭铸着“中央术师1930·国立术师1958”字样,呈现出近代以来天津中等体育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是国立术师1930·天津体育学院1958建校80周年。

题为1995年发行的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纪念章。



海河富民桥(水彩画) 叶武 文并图

富民桥位于天津市海河中游,是中心城区跨越海河的关键通道,北起河东区富民路,南接河西区洞庭路,2008年5月正式建成通车。这座桥梁全长340.3米,是天津市唯一一座独塔自锚式悬索桥,主跨157米的主缆呈现三维空间抛物线形态,边跨主缆采用双缆并排形式。我的这幅水彩写生作品聚焦这座桥梁的独特魅力:以单塔为视觉中心,洗练的天空背景衬托出水彩的立体线条与悬索结构的韵律感,通过水彩的艺术语言,定格桥梁兼具工程之美与视觉之美的瞬间。



金山岭长城拦马墙

秦代把马的写实主义玩到了巅峰,秦始皇陵的陶马群,就是一支地下马军。如今站在兵马俑坑前,看着这些陶马昂首挺胸的样子,仿佛还能听到两千多年前,它们踏着尘土奔向战场的嘶鸣声。

秦朝不光有主动出击的万匹铁骑,更有被动防护的万里长城。养马与修长城,哪个更划算?这是历朝历代都在算的一笔大账。

对于农耕地区来说,养马太不划算。古人宁可在崇山峻岭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修筑万里长城,也不大规模蓄养骑兵。因为游牧骑兵的特点,不以占领地盘为目的,而是以掠夺财富为目标,气势汹汹地进来,满载而归去也。长城是阻挡在骑兵面前的一堵墙,可以拦截,也可以预警,敌人必须集中力量找到薄弱点进行突破,这样就给了墙内坚壁清野和集结军队的时间,让对方进来之后抢不到,还容易被围歼。

马背上的中国史(二)

养马与修长城

赵威

这堵墙是山岭之间的“高速公路”,置身山海,从这座山翻到那座山,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大规模行军就更慢了。有了长城这条“高速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集结军队,对方虽然能拼力撕开一个缺口进到关内,但掠夺一番后,有被堵住的风险。所以骑兵部队达不到一定规模,不敢轻易尝试发起进攻,这也倒逼一盘散沙的草原部落形成统一的力量,结成部落联盟,联盟之间结成更大的联盟,甚至建立统一政权,尽可能集结更强大的骑兵部队南下。

修筑长城,一劳永逸,性价比高。相对来说,农耕地带养马很不划算,王安石就算明白这笔账。北宋自建立始就在北方处于被动防御态势,长期收缩在温带的平原丘陵,失去了可以养马的地方,马匹奇缺,军队不堪一击。一心想要富国强兵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保马法”。政策解读如下:由政府出资购买马匹,分配给农民饲养,这样就省去了朝廷在养马过程中的种种耗费。民户自愿参加,根据自家财力,认养

一匹或两匹,得到的报偿是,官府免除他们一定的赋税,马匹也被允许当作牲口用,帮助民户干农活或者骑行,养得好的,还给予一定的奖励。战时再将马匹集中起来。但是,养死了,民户要赔偿。

“保马法”看似美好,真正实行起来,百姓发现是一个“大坑”。马不是那么好养的,不耐高温炎热,极易生病。马的食量很大,也不是反刍动物,一天到晚吃吃吃,吃得多,拉得多,所以说马无夜草不肥,养活一匹马,需要大量耕地用来种草,成本太高。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25个人。马耕相对于牛耕也有天然的劣势,马的性子不像牛那样温顺,不好驾驭不说,因为是“直肠子”,走到哪儿拉到哪儿。马粪的热性高,在堆积过程中会产生高温,对庄稼根系造成伤害。

“马政”一出,宋朝的一些地方官为了追求政绩,将自愿改为强迫,百姓怨声载道。“马政”猛于虎,很多地方甚至激起民变。很快,“保马法”被废除。

